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中亚地区一体化^{*}

杨恕 王术森^{**}

【内容提要】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地区一体化需要完成“社会类别化”、“社会比较”和“社会认同”三个阶段。中亚地区目前处于社会比较阶段,推进该地区的一体化,需要各国进入社会认同的阶段。而俄罗斯倡导的各种地区一体化机制的存在与运行,是导致中亚国家难以进入社会认同阶段的外部原因之一。尽管不排除未来中亚地区一体化取得一定进展,但无论这种进展是在内部协调下取得的,还是在外部积极推动下实现的,均有赖于中亚各国之间超越目前的社会比较阶段进入社会认同阶段。2018年3月中亚峰会的召开,或许意味着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有望获得重启。不过,中亚国家形成一种彼此认同的集体身份,仍是一个长期前景而不是眼前现实。

【关键词】中亚地区一体化 欧亚经济联盟 中亚集体身份认同 中亚峰会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3-0045(31)

2018年3月15日,中亚五国元首在时隔九年后再次举办首脑峰会。会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强调,“要致力于加强与邻国,其中主要包括拥有共同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①这无疑是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专项项目“中亚五国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17VDL003)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带一路’双重身份国家地位、作用与特征研究”(项目批准号:16LZUJBWZX002)、“‘一带一路’双重身份国家的地缘分析”(项目批准号:16LZUJBWYJ039)资助。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中肯修改建议,文中错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 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王术森,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① “中亚五国元首在首都总统府举行会晤”,http://www.inform.kz/cnarticle_a3185691

在强调推进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性。然而，尽管中亚地区对一体化的尝试可以追溯到独立初期，但该地区至今仍未实现较高水平的一体化。这一现象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本文尝试从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回顾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演变过程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进行简要讨论。

一、中亚地区一体化的研究现状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开始了各自的独立建国进程。目前，从中亚地区一体化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意味着五国在“去一体化”方面开始同步。基于固有的历史联系和现实的经济、安全依赖，中亚五国曾进行过诸多“一体化”尝试。如乌兹别克斯坦于 2004 年提出的“中亚关税同盟”构想，以及哈萨克斯坦于 2005 年提出的“中亚联盟”构想。但上述构想并没有得到中亚其他国家的积极响应。目前在中亚地区影响较大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或倡议，主要是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尽管从理论上讲，中亚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可以带来更高收益，但现实情况是，各国并未实现较高程度的合作，更不要说实现“一体化”了。甚至有学者认为，中亚地区出现了“逆一体化”的趋势。^①

无论是此前中亚地区一体化遭遇的诸多困难，还是未来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前景，都值得作进一步研究。具体而言，不仅需要明确导致此前中亚地区一体化停滞不前的原因，还需要把握未来中亚地区一体化取得突破需要克服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对今后中亚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做出较为准确的把握与评估。在阐明本文的理论视角之前，有必要对国内外学术界就中亚一体化这一议题所做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梳理，以明确本文的努力方向及可能贡献。大体而言，围绕中亚一体化这一议题，国内外学术界主要做了以下研究工作。

^① 石泽：“中亚‘逆一体化’给上合带来的挑战”，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3-05/3915601.html

（一）关于中亚一体化现状

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层面的中亚各国对外政策以及地区层面的国家间互动展开。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中亚国家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一体化进程。大多数学者认为，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一体化程度高于经济领域。^①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学者们认为中亚各国在安全领域面临相似的威胁，使各国有较大的动力在政策层面进行更多的协调。这些威胁包括外部大国的博弈、“三股势力”的蔓延等。而经济领域的一体化程度较低，主要是因为中亚五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既涉及资源禀赋的差异，又涉及中亚各国自独立以来在发展方面的差距。

在理论视角方面，学术界一般在将中亚五国视为整体的基础上，运用“地区主义”或“新地区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中亚一体化进程面临的制约因素及其原因。^②如时任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东西方文商研究中心的亚历山大·利布曼（Alexander Libman）教授、欧亚发展银行（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一体化研究中心负责人叶夫根尼·维诺库洛夫（Evgeny Vinokurov）等，将中亚地区一体化视为欧亚一体化的一部分，认为应将中亚一体化进程纳入大欧亚地区考虑。^③目前，较为成熟的研究，是从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寻找对中亚一体化的启示，抑或探究中亚五国能否复制或建立类似机制，如“欧盟模式在中亚地区如何发展”，“东盟一体化能否在中亚被复制”

① Kathleen Collins,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onalism among Patrimonial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Case of Central A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09, Vol.61, No.2, pp.257-261.

② 有关这一视角的解释，可参考 Derrick Frazier, “Regional Powers and Security: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Order within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 Vol.16, No.4, pp.731-753; Damian Rosset, David Svarin, “The Constraints of the Past and the Failure of Central Asian Regionalism, 1991-2004”, *Region Regional Studies of Russia Eastern Europe & Central Asia*, 2014, Vol.3, No.2, pp.245-266.

③ Alexander Libman, Evgeny Vinokurov, “Is it Really Different? Pasterns of Regionalisation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11, Vol.23, No.4, p.486; Johannes Linn, “Central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Reality or Mirage?”, *Eurasian Integration Yearbook 2012*, pp.96-117.

等等。^①除此之外，乌兹别克斯坦国立世界语言大学（Uzbekistan State University of World Languages）学者乌卢格别克·阿兹佐夫（Ulugbek Azizov）认为，传统的“是什么的知识”（knowing that），限制了对中亚一体化的认知，进而提出了一种理解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新框架——“怎么做的知识”（knowing how）。即，强调从实践层面理解中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尤其是行为体自身如何在国际体系中扮演角色并发挥作用。^②学术界普遍承认中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缓慢。

（二）关于影响中亚一体化进程的因素

很多学者注意到“中亚一体化进程缓慢”这一现象，并试图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是“内因说”，即认为中亚五国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独立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影响着各自的外交策略选择，使各国在政策或行动上存在一种张力，难以形成集体身份。^③加上中亚地区的水资源分配、边界划

① 关于欧盟与中亚地区一体化的研究，可参考 Burcin Ahmet, Mustafa Kızıltan and Emre Atsan, “Analysis of Central Asia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ject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nvergence hypothesis”, *Socioeconomica*, 2015, Vol.4, No.8, pp.253-276; Peter Jones, “Regulatory regionalism and education: The European Union in Central Asia”,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2010, Vol.8, No.1, pp.63-66; Rilka Dragneva and Kataryna Wolczuk, *Russia, 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and the EU: cooperation, stagnation or rivalry?*,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August 2012. 关于中亚地区一体化与东盟的研究，可参考 Stephen Aris, “A new model of Asian regionalism: doe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ave more potential than ASEA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Vol.22, No.3, pp.454-464; Chinara Esengul, “Compar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Asia”,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Review*, 2011, No.3, pp.18-38。

② Ulugbek Azizov,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From knowing-that to knowing-how”,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7, Vol.8, No.2, pp.123-135.

③ 中亚国家之间的差异对一体化产生的影响，可参考 Inomjon Bobokulov, “Central Asia: is there an alternative to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6, Vol.25, No.1-2, pp.81-87; Luca Anceschi, “Integrating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cases of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0, Vol.29, No.2, pp.144-148; 周明：“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探析”，《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第32-50页。

分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这无疑使中亚一体化的进程步履维艰。^①同时，亚历山大·利布曼强调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地区一体化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为中亚其他国家的发展树立了典范，但哈国推动一体化的热情无法替代其他中亚国家的参与。^②土耳其哈斯特帕大学（Hacettepe University）的三位学者运用经济收敛理论，评析中亚地区现有的一体化机制及进程，指出哈萨克斯坦的快速发展，也可能在地区一体化中产生阻力。他们通过对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统一经济空间及中亚四国（土库曼斯坦除外）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行定量分析，认为经济离散趋势远远超过收敛趋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塔、吉、乌三国，与俄、哈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距。^③此外，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政治学副教授凯瑟琳·柯林斯（Kathleen Collins）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强调在威权体制下，各国希望推进各自的国家利益，进而导致地区经济一体化停滞不前。^④

其二是“外因说”，即将中亚一体化停滞不前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大国对该地区事务的介入，这使中亚五国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进行外交选择，难以实现合作。^⑤尤其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大国基于在中亚地区各自的战略考虑，推行不同的安全或经济合作机制，致使该地区“制度过剩”。与此同时，该地区目前尚未形成一种囊括中亚五国的合作机

① Asel Murzakulova, Irène Mestre,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dynamics in border communities of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research report”, 2016; Leila Zakhirov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water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13, Vol.65, No.10, pp.1994-2013.

② Alexander Libman, “Informal Integr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in Joachim Ahrens and Herman Hoen, eds.,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Central Asia: Politico-economic Challeng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171-187.

③ Burcin Ahmet Yereli, Mustafa Kızıltan and Emre Atsan, “Analysis of central Asia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ject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nvergence hypothesis”, pp.253-276.

④ Kathleen Collins,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onalism among patrimonial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case of Central Asia”, pp.249-281.

⑤ 有关大国介入地区事务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参见Teemu Naarajärvi, “China, Russia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Blessing or Curse for New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Asia Europe Journal*, 2012, Vol.10, No.2-3, pp.113-126; Peter Krasnopolsky, “Major powers and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http://web.isanet.org/Web/Conferences/GSCIS%20Singapore%202015/Archive/8e26ebb3-f4a3-4a13-ac59-adb0ee445aa5.pdf>

制,因而一体化程度十分有限。^①瑞士纳沙泰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uchatel)学者达米安·罗塞特(Damian Rosset)、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学者戴维·斯瓦林(David Svarin)指出,地区性霸权国家在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们还将内外环境结合起来解释中亚地区一体化,认为中亚的一体化既受各国不同的认知和战略的影响,同时也与俄罗斯、美国的角色有关。^②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受到地区合作机制的影响,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学者里尔卡·德拉格尼娃(Rilka Dragneva)等人将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下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取得的进步,归因为该机制基于规则的设计,而且这种设计与世界贸易组织及国际规则相符。^③总体来看,学术界认为影响中亚一体化的因素主要涉及:外部大国的干预使地区的博弈态势明显,地区性竞争愈演愈烈;中亚五国之间差异显著,使一体化进程受阻,各国实行的权威统治也对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阻力^④;地区内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难以提供推进一体化进程的有利环境;加上大国与中亚国家推进一体化的能力或意愿不足,使该地区一体化进程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三) 关于中亚一体化前景

对于中亚地区的发展前景,尤其是中亚一体化能否实现、中亚各国集体身份能否形成,学界的观点大都较为模糊,这与该地区复杂的形势有关。大体而言,对中亚一体化前景的展望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中亚五国能够形成集体身份的乐观派。这一派认为:中亚国家具有大致相似的文化和历史经历,且中亚五国都曾尝试推动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而一体化之所以未

① Kathleen Collins,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onalism among Patrimonial Authority Regimes: The Case of Central Asia", pp.255-256.

② Damian Rosset, David Svarin, "The constraints of the past and the Failure of Central Asian Regionalism, 1991-2004", pp.245-266.

③ Rilka Dragneva, Kataryna Wolczuk, *Russia, 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and the EU: cooperation, stagnation or rivalry?*, p.2. 此外,普京也曾明确强调欧亚经济联盟将遵守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参见 Начало заседания Высше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в узком составе. 29.05.2014.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45788>

④ Nicholas Kunysz, "From Sultanism to Neopartrimonialism? Regionalism within Turkmen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2, Vol.31, No.1, pp.7-10.

能实现，是因为中亚国家自身的能力（包括经济、军事、科技等）十分有限，难以独立且有效地应对本地区事务，因此对外部力量产生依赖。同时中亚五国的对外政策取向又存在差异，各国对一体化进程的推动效果非常有限。假若中亚五国内部能够加强沟通与协商，秉持较为一致的态度，那么中亚一体化将更容易实现。此外，乐观派大都认为，当前中亚五国所面临的艰难状况，是中亚地区合作进程的一个具体阶段，“当下的中亚属于一个有限的自由流动形态”，^①进行的是一种“维系式一体化”（holding-together integration），^②这种一体化进程与国家的多重转型相伴而生，至今仍在进行。

另一种是对中亚一体化持怀疑态度的“悲观派”。悲观派认为，中亚地区很难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一体化。这种观点在注意到中亚国家拥有相似的历史经历的同时，更强调当前中亚各国在推进一体化过程中的失败尝试。如卡里莫夫与纳扎尔巴耶夫曾提出关于中亚一体化的倡议，但均未得到其他国家的积极响应。^③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伊·艾里森（Roy Allison）认为，中亚地区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大都是外部大国主导的，这不仅使中亚五国丧失了独立解决地区事务的主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水平。^④悲观派认为，中亚各国面临的这种形势，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转。尽管欧亚经济共同体是独联体地区较为成功的一体化机制，但有学者指出，这仅仅是一种粗浅的一体化（shallow integration），原因在于各国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强化一体化。换言之，它们之间的一体化，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不是基于市场进行的劳动分工。这种一体化很难形成巨大的市场效应，也不能为成员国带来更多的利益。^⑤

综上所述，与中亚一体化相关的研究成果颇多，尤其是对一体化进程的

①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147页。

② Alexander Libman, Evgeny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12, pp.11-16.

③ Farkhod Tolipov, “Micro-geopolitics of central Asia: a Uzbekistan perspective”, *Strategic Analysis*, 2011, Vol.35, No.4, p.633.

④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Vol.27, No.2, pp.192-197.

⑤ Wang Weiran, “The effe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 Trade*, 2014, Vol.50, No.2, pp.226-227.

解释成果最为丰富。现有关于中亚地区一体化的诸多研究成果，不仅为人们了解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演变过程勾勒出了较为清晰的画面，也指出了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亚一体化可能的发展方向，这对于人们增进对中亚一体化的理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尽管如此，现有成果对中亚地区一体化的研究大多是情境式的分析，较少从理论层面把中亚一体化的演变过程、存在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纳入一个统一的、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中加以研究。本文拟运用社会认同理论对此进行分析，尝试弥补现有研究的这一缺憾。

二、社会认同理论对于理解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可行性

如前所述，关于中亚一体化的现有成果集中关注现实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各国不同的发展战略在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的影响。通常是基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进行分析，较少有成果注意到国家的身份建构对中亚一体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国家在与国际社会互动中所建构的身份，对了解各国对地区一体化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必要将视角移至身份建构的过程，关注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建构，审视中亚五国的集体身份，以此探寻中亚一体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目前，关于“身份”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本文将沿用建构主义对国家身份的相关界定，即“身份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国家是一个团体自我，具有群体层面上的认知能力。^①由于本文的关注点是中亚一体化进程，因此将重点关注温特所说的“类属身份和集体身份”。类属身份只有具有社会内容或意义的相同特征时才能构成。在国家体系里，类属身份的对应物，是“政权类型”(regime type)或“国家形式”(forms of state)。集体身份则把“自我-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0-221页。

是把自我和他者合为同一种身份。^①以中亚五国为例，类属身份是指，中亚各国在政权形式上都受到威权政治的影响；集体身份则是中亚五国虽已独立多年，但基于历史、文化和发展路径的相似性，所形成的“中亚国家”这一集体认知。

社会认同理论最早由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和约翰·特纳（John Turner）等人提出。泰弗尔与特纳在研究社会群体互动，尤其是族群冲突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在该理论中，泰弗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②一般而言，社会认同由三个基本过程组成：社会类别化（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③社会类别化是指对事物进行归类过程，泰弗尔的研究表明，进行类别化是形成群体间边界的充分必要条件，且是实现群际区分的前提。即，个体根据自身实际，进行必要的“自我归属”，以形成“我群体”。社会比较是在社会类别化之后，通过内部群体的相似性，逐步强化“我群体”观念，既是一种对内群体的相似性感知，又是一种凸显外群体的差异性感知。正是在这一感知过程中，社会成员逐步达成内群体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则凸显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差异，并强调这一差异的“利我特征”，即“我群优于他群”，通常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

本文将采用上述分析框架，透过这三个阶段历程，对中亚一体化进程进行分析。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上述框架适用于分析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原因予以说明。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22、224页。

② Henri Tajfe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Chapters 1-3.

③ Henri Tajfel, John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J. T. Jost and J. Sidanius, eds., *Key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Political psychology: Key readings*, New York, NY, US: Psychology Press, 2004, pp.276-293.也有学者将这三个历程视为三种必备的机制，但在具体翻译上存在差异性，如聂文娟曾将三者归结为：社会类别化、社会比较与积极区分。在本文中，为了便于理解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之间的差异，将三者分别称为：社会类别化、社会比较与社会认同。参见聂文娟：“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88-90页。或是将三者归为：类化、认同和比较，认为这三者是社会认同的基本原理。参见赵志裕等：“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207页。

其一，社会认同理论主要是从集体身份形成途径之一——社会认同路径——探索群体的集体身份如何形成，更多地关注决定认知和行为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群体层面的群体进程和群际关系。在群体因素的基础上研究群体认同与群际关系，有助于避免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在解释集体身份时存在的还原主义倾向。^①因为后者在构建建构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对国家间集体身份形成过程的论述，设想了自我与他者两个个体在没有任何互动经历和历史记忆的背景下，通过“首次相遇”而逐渐形成的。^②而且温特的建构主义明确秉持“国家也是个人”的假定，从而将群体人格化。^③而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社会认同主要来自于群际互动进程，强调的是群体内成员共享的内群体身份。^④基于此，本文将从“群体成员身份形成”这一视角，来分析中亚一体化进程，主要关注国家以中亚一体化参与者所呈现出的行动。在动态进程中，把握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形成。这有助于打破对中亚一体化进程进行静态分析的传统，为理解地区一体化提供一种动态的分析视角。

其二，中亚一体化的实际发展阶段，与社会认同理论对社会认同三个演变阶段划分之间的对应性。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有赖于中亚五国之间实现较高程度的彼此认同，即，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实现，是以中亚地区认同的形成作为前提和表征的。而这种身份认同的形成，意味着中亚五国已经共享了一种集体身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苏联时期中亚国家之间共享众多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但它们只是处于同一个主权国家的不同行政单位。所以，一旦获得独立，且它们有志于推进地区一体化，那么它们首先需要产生中亚五国属于同一个地区的意识，即它们首先需要形成一种它们属于，而且只有它们属于中亚地区的类属身份。用社会认同理论的术语来表达，中亚国家通过社会类别化，形成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区国家的类属身份，构成中亚各国开展地区一体化进程的起点。在中亚五国形成同属一个

① 方文：“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成长历程”，《心理学报》，2002年第6期，第653页。

②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0-321页。

③ 尽管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持群体人格化的假定，但并没有将此作为一个理论命题集中加以阐释。温特对此所做的分析参见 Alexander Wendt, “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Vol.30, No.2, pp.289-316.

④ 聂文娟：“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第88页。

地区的类属身份，与彼此形成高度认同的社会认同之间，还需经过社会比较的过程。因为唯有通过社会比较，中亚五国才能进一步意识到本地区的独特性与发展潜力、推进一体化的优势，以及由域外国家参与或主导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存在的缺陷，等重大问题，进而使各国产生同属本地区的自豪感，并意识到地区一体化进程，是实现各国和平繁荣与协调发展的必要渠道，从而产生参与和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内在动力。换言之，在社会类别化与社会认同之间，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还需经过社会比较的阶段。如此，运用社会认同理论，来理解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就有了可行性。

其三，需要明确的是，中亚一体化进程，有别于东盟及欧洲地区国家所推行的一体化进程，前者更适用于动态分析框架。这是因为中亚国家历史上曾共享集体身份，但独立后却走上了“去一体化”道路，而实现一体化的目标却停留在纸面上。不过，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去一体化”进程，是社会类别化进程的一部分。因为各国的国家建设和主权巩固，是以各国在尽可能摆脱各种被视为障碍的国家或地区间联系为代价的。尽管如此，也正是经由这一过程，各国才会产生它们同属同一个地区、共享诸多相似特征的类属身份。无论如何，对中亚国家经历“去一体化”这一反常现象的理解，不仅需要关注当前的现实因素，还需要把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社会认同理论，是从过程的角度观察集体身份的变化了的，因而能为理解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遵循上述研究思路，下文将运用社会认同理论，对中亚一体化的发展进程进行讨论。

三、截至目前的中亚一体化进程：社会类别化与社会比较

中亚国家自独立以来的一体化进程，大致可以 2001 年的“9·11”事件为界线：苏联解体至“9·11”事件前的十年时间，为中亚一体化进程的第一阶段；“9·11”事件至今可视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亚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塑造和完善独立国家身份，获得国际承认，因此一体化并不是各国的优先目标。第二阶段，中亚国家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稳定，寻求发展，积极

融入国际社会，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之为“国际化”阶段。^①本文将中亚独立以来的一体化进程，总结为从“去一体化”到“国际化”的发展过程，而一体化则是远景目标。目前，中亚一体化进程处于“国际化阶段”，尚未形成足以实现集体身份的社会认同。从社会认同理论来看，从苏联解体至“9·11”事件发生，是中亚一体化的“去一体化”阶段，属于社会认同理论所说的“社会类别化”；从“9·11”事件至今，是中亚一体化进程的“国际化阶段”，属于社会认同理论所说的“社会比较”；未来能否实现“社会认同”且最终形成集体身份，则主要取决于中亚国家能否实现成员身份的共享，形成积极的社会认同。中亚国家自独立以来的一体化进程，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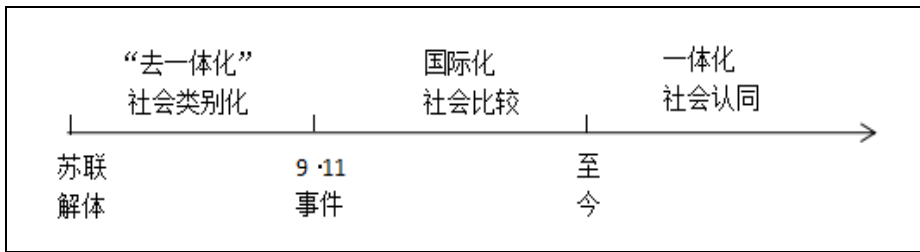


图 1 中亚一体化进程示意图

整体而言，目前中亚国家尚未完成“社会比较”阶段，同时离一体化目标相距甚远。这是因为中亚各国仍面临多重国际机制的选择，正是在这一比较过程中，不断发现差异，进行比较，进而得出结论，从而决定中亚各国能否形成集体身份。至于这一阶段何时能够完成，则需要进一步观察。此外，中亚地区的国际化进程，仍可在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中持续，即中亚可作为整体参与国际社会。

（一）中亚一体化的第一阶段：社会类别化

社会类别化，可以简单理解为个体基于自身特征进行自我的群体归属。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可实现自我身份的“内群体”化，即实现由“个体/

^① 这一阶段，中亚国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与此同时各国也尝试开展一些一体化工作，并取得了积极进展。

群体的自我”向“群体/他群体的自我”转变。就中亚国家而言，这不仅是一种从个体身份向群体身份转变的过程，也是从一个群体身份向另一个群体身份变换的过程。中亚国家的身份具有双重性。苏联解体之前，是个体层面（苏联加盟共和国）与群体层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解体之后，是个体层面（国际社会的独立行为体）与群体层面（中亚地区国家）。

苏联解体造就了中亚国家独立的国家身份，并开始了它们作为独立国家的转型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政治转型与民族国家构建是同步进行的。中亚五国通过发布主权国家独立宣言，确立了各国的独立身份，并积极寻求国际社会对其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它们均于 1992 年 3 月 2 日被联合国接纳为正式会员国，自此开启了国家身份的社会类别化进程。众所周知，该进程面临着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即继续走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选择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选择决定着中亚国家的社会身份。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打破苏联时期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市场经济；第二阶段是对本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整与完善。中亚各国的经济转轨，是一种经济改革与克服危机并行的举措。且各国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对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政策等多个方面存在不同认知，使其最终走上了并不完全同步和一致的经济道路。不过，各国均进行了价格制度、财政金融体制、对外贸易政策及农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尽管程度有别，但各国的目标都是致力于实现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

在这一阶段，中亚地区在经济领域的一体化进程，可以追溯到 1994 年的中亚经济联盟（Central Asian Economic Union）。该组织最早由哈、吉、乌三国创设，塔吉克斯坦于 1998 年加入，同年该组织改名为中亚经济共同体（Central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①这一组织的发展历程，表明中亚国家希望推动经济一体化的意愿，而且各国在该机制框架下通过了许多决议，

^①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ЦАЭС)(справоч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17.04.2001. http://www.mid.ru/central-noaziatskoe-soobsestvo-cas-/-/asset_publisher/0vP3hQoCPRg5/content/id/585382

但具有实践意义的成果并不多。^①这主要是受到各国之间经济差距、利益偏好，以及组织缺乏强制性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在安全领域，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明显受到大国的干预。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中亚地区尚未出现由中亚五国共同参与的安全合作机制。1992年，俄罗斯同哈、吉、塔、乌、亚美尼亚，签署了《集体安全条约》；2002年成立了旨在提高集体防御能力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ОДКБ）。但由于土库曼斯坦始终未参与，乌兹别克斯坦两次退出，因此很难说该组织是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机制。此外，集安组织也面临资金困难，这些因素都影响到该组织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总体来看，在社会类别化阶段，中亚国家主要致力于确立其不同于苏联时期的独立主权国家身份。通过政治转型与经济转轨，塑造良好的独立国家形象。并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承认，参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这一系列举措明确了中亚五国与苏联旧有体制、甚至与俄罗斯之间的界限，凸显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性，改变了国际社会所持的中亚国家与苏联存在同质性的认知。这是对刚刚获得独立的中亚五国的重新定义，有助于实现中亚国家作为“内群体”的身份归属。但由于中亚五国差异太大，而且它们的优先目标并不是实现一体化，因此各国非但没有在一体化进程上取得进展，反而出现了“逆一体化”的趋势。即便如此，这一阶段也是在与他群体的互动中进行并完成的，同时确立了“中亚”这一内群体，相较于他群体的界限。苏联时期将自身视为与其他中亚国家有所不同的哈萨克斯坦，曾积极推动中亚五国的一体化进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中亚国家”的类属身份真正成了已成为主权国家的中亚五国的集体意识。此外，在与阿富汗这个冲突频仍、局势动荡的南部邻国相比较的过程中，中亚国家逐渐意识到并认同各国同属中亚国家这一事实。其中，通过社会类别化过程，中亚五国均构建了自身作为“非阿富汗式国家”的类属身份，尽管这一类属身份是通过逆向认同的身份构建过程产生的。^②总之，在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双重

^① Richard Pomfret,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Central Asia: how far will integration and cooperation proceed?”, in David Denoon, ed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uture of Central Asia,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26-327.

^② 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148-153页。

影响下，中亚国家的社会结构同苏联时期相比，呈现出多元化特征。^①这些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性，促使其形成较为稳定的身份归属——中亚国家。

（二）中亚一体化的第二阶段：社会比较

社会比较是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对比，凸显内部成员的相似性以及外部成员的差异性。这一比较的过程，对集体身份的形成十分关键。正是这一比较，使“我群”所具有的独特性，有了社会意义和内涵。^②在比较的过程中，国家突出强调的是“我群”内部的相似性，及“我群”与“他群”之间的差异。两者是相对比而言的，这种比较影响了群体的社会认同。群际间差异性产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当“我群”较之于“他群”所具有的特征有助于个体的发展时，会形成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反之则会形成消极的社会认同。这种差异性使集体身份的形成，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因此，群体身份有可能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产生分离倾向，即，不同行为体不是相互认同，反而相互排斥、彼此疏离。

“9·11”事件后，中亚地区因地缘因素的特殊性，成为大国竞相关注的区域。这虽然为中亚各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也使该地区因“大博弈”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发展态势。除开展相关合作外，维护国家和地区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成为中亚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中亚国家实行多元平衡的对外政策，客观上加剧了大国在该地区的竞争。其中，美俄两国的竞争尤为突出。由于美俄在地区层面上面临着“安全困境”，因此双方在中亚地区倾向于开展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合作，这使中亚各国面临“选边站”的难题。中亚国家尽可能选择一种较为平衡的外交，利用美俄之间的竞争关系，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这往往不利于深化中亚各国之间的合作，亦无助于推进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结合各国的实践情况来看，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并未取得明显进展。哈萨克斯坦作为唯一与俄罗斯接壤的中亚国家，在重视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

① 吴宏伟主编：《中亚地区发展与国际合作机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0-113页。

② Henri Tajfe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63.

同时，也十分重视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合作。应该说，哈萨克斯坦在扮演中亚国家与俄罗斯联系纽带的同时，也充当着俄罗斯与中亚四国的屏障。土库曼斯坦则以中立原则为基础，更多地游离于中亚事务之外，其首要关注点是本国的能源问题，因此更加重视发展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五国中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倾向于借助美国和北约来维护自身安全。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五国中资源较为不丰富的国家，对俄罗斯有着较强的依赖。塔吉克斯坦经历内战之后形成一种表面的稳定，始终把发展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放在首位。^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统的对外关系选择，在大国竞争中可能出现变化。如乌兹别克斯坦在 2005 年“安集延事件”发生前，曾利用美国来削弱俄罗斯对本国的影响，之后又转向俄罗斯以抵御来自美国的压力。与此相似，塔吉克斯坦的亲俄倾向也受到了影响——由于获得了来自美国的援助，塔吉克斯坦对俄罗斯的态度有所改变。^②这表明，在日趋激烈的大国博弈中，中亚各国亦在比较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特征，然而这种差异性并没有过渡到社会认同的阶段——凸显群体的利我性特征——“我群优于他群”。这反映了中亚国家在推进一体化过程中面临巨大阻力，主要表现为诸多国际合作机制并不能完全满足中亚各国的利益需求。因此，基于群体之间边界的流动性特征，中亚一体化仍处于中亚各国寻找差异的社会比较阶段。

具体到中亚地区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一体化进程，可以发现，中亚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由于中亚国家目前并没有选择完全倒向某一大国，而是倾向于开展平衡外交，且青睐与大国开展双边外交，这使得在中亚地区建立涵盖中亚五国的多边合作机制十分困难。总体来看，中亚各国在经济一体化领域取得的进展主要表现为：首先，中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于 2002 年签署了成立中亚合作组织的条约。该组织的目标，是分阶段实现统一经济空间的计划，此外还举行了讨论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会议。然而，该组织 2005 年并入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其次，中亚地区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推动之

① 曾向红、杨双梅：“大国协调与中亚非传统安全问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50 页。

② Roy Allison,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i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4, Vol.80, No.3, p.481.

下，形成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CAREC），旨在通过促进地区贸易便利化，来推进地区经济发展。^①联合国也出台了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SPECA），致力于推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但受制于联合国的金融能力及该机制本身的非正式性，它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②由此可见，中亚国家尽管形成过一些经济合作机制，但由于各国的不同政策及其对地区一体化缺乏意愿，从而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致使各种经济合作机制难以出台或落实强有力的经济规范，因而未能在促进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在安全领域，中亚地区并未形成真正推进地区安全一体化进程的组织。尽管该地区存在诸多安全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美国与北约资助组建的“中亚维和营”、欧盟资助的“中亚边界管理项目”与“中亚毒品行动计划”，以及俄罗斯主导的集安组织^③，但由于上述组织并非推进中亚安全事务的专门性组织，覆盖着较多的领域且所辖地区并不局限于中亚，因而在推进地区安全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较为有限。

鉴于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缓慢且叠床架屋，有学者将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比喻为东南亚“投资地区化模式”（investment regionalization model）与西非南亚地区“非正式贸易地区化模式”（informal trade regionalization model）的结合。^④事实上，除去外部因素的影响，中亚五国之间仍存在诸多制约多边合作的因素，尤其是此前乌兹别克斯坦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较多矛盾，加上土库曼斯坦作为中立国，通常对地区合作机制持较为谨慎的立场，这也使得作为内群体的中亚国家内部，呈现出明显的“身份分离化”特征。这一特征意味着，社会比较不仅强化了群体的边界性，同时也使边界富有流动性，即中亚国家在“内群体”身份难以满足其自身要求时，可通过向其他群体的流动，实现身份转换。这种选择降低了群体内部的认同，并会对内部群体产生一种消极的社会认同。这也是当前中亚地区难以形成集体身份、甚至出现“逆一体化”趋势的重要原因。

① Johannes Linn, Oksana Pidufala, “The Experience with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 Lessons for Central Asia”,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roject-document/67708/37034-reg-dpta.pdf>

② Ibid.

③ 参见周明：“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探析”，第35页。

④ Alexander Libman, “Informal Integr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p.178.

四、中亚地区一体化进入社会认同阶段的困难 ——以域外国家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的牵制为例

依照社会认同理论的解释来审视中亚一体化进程，可以发现，当前中亚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中亚国家难以从“社会比较”阶段进入“社会认同”阶段。而这一过渡的实现，必须由中亚国家通过社会比较，意识到地区一体化是实现各国发展和地区稳定的有效途径，如此才能最终实现地区认同水平的提升，并形成中亚国家之间的集体身份。然而，一系列内外因素阻碍了集体身份的形成。如苏联解体给中亚国家造成冲击、各国在国家层面致力于国家建构、中亚国家之间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以及俄美在地区层面的博弈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中亚一体化停滞不前。^①上述因素虽然对中亚地区一体化产生了牵制作用，但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来看，中亚国家无法通过社会比较获得一种明确且独立的地区身份，才是导致各国不愿或无力实现地区一体化的深层原因。

而中亚地区存在多种地区一体化的机制、协定或倡议（见表 1），又是导致中亚国家缺乏全力推动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原因。尽管现有研究注意到大国博弈对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影响，但未能深入分析大国主导的地区机制或倡议，对中亚地区一体化所产生消极影响的具体途径。众所周知，中亚地区存在许多地区一体化的机制、协定或倡议，然而这些机制、协定或倡议大多是由大国主导或参与的，即，参与者往往不只有中亚国家，而中亚国家主导提出或设立的机制、协定或倡议大多难以为继。这种现象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中亚国家缺乏独立推动本地区一体化的意愿和能力；其二，域外国家主导或推动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削弱了中亚国家自主实现地区一体化的内部动力。当中亚国家不再或无意独立开展地区一体化进程时，它们无从将本地区各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域外国家或地区进行深入比较，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对属于本地区的自豪感，更谈不上形成高度的集体认同。而域外国家推动或主导的各种地区一体化机制、协定或倡议，由于不只涵盖中亚国家，故它们不可能以中亚地区作为其开展工作的出发点或重点，自然也不会将推进中亚

① 详细参见周明：“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探析”，第 32-50 页。

国家一体化作为目标。如此一来，中亚各国也就失去了以本地区作为一体化工作的整体视野。

表1 包含全部或部分中亚国家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机制、协定或倡议

时间	机制、倡议、协定	参与国家
1991	独联体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俄、白、中亚五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 2005 年退出)
1992	经济合作组织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中亚五国
1993	中亚五国共同市场协定 (Protocol of Five Central Asian States on a Common Market)	中亚五国
1994	中亚经济联盟 (Central Asian Economic Union)	哈、吉、乌
1995	关税同盟 (Customs Union) 也称海关同盟	俄、白、哈、吉(1996), 塔(1999), 乌(2006)
1996	深化经济及人道主义领域一体化条约 (Treaty on Deepening Integration in the Economic and Humanitarian Sphere)	俄、白、哈、吉、塔(1999 年加入)
1997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 (Central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itiative, CAREC)	中国、阿富汗、阿塞拜疆、蒙古、巴基斯坦、中亚五国等 10 个合作伙伴国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伊斯兰发展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等 6 个多边合作伙伴
1998	中亚经济特别方案 (Special Programme for the Economies of Central Asia, SPECA)	中亚五国、阿塞拜疆(2002)、阿富汗、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亚太经社理事会
1998	中亚经济合作组织 (Central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由中亚经济联盟改名而来	哈、吉、乌、塔
2000	欧亚经济共同体 (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同时成立了一体化委员会	俄、哈、吉、塔、白、乌(2006-2008)
2001	上海合作组织 (SCO)	俄、中、哈、吉、塔、乌, 印(2017)、巴(2017)
2002-2005	中亚合作组织 (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ACO), 前身是中亚经济联盟, 1998 年更名为中亚经济合作组织, 2002 年更名为中亚合作组织, 2005 年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	哈、吉、乌、塔, 俄罗斯(2004)

2010	俄白哈关税同盟	俄、白、哈
2011	欧亚经济一体化宣言 (Declaration on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俄、白、哈
2015	欧亚经济联盟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2014年5月29日签订条约)	俄、白、哈、吉、亚美尼亚

资料来源: Kathleen Collins,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onalism among patrimonial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case of Central A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09, Vol.61, No.2, pp.265-266; Rilka Dragneva, Kataryna Wolczuk, *Russia, 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and the EU: cooperation, stagnation or rivalry?*,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August 2012; 王维然、赵凤莲: “欧亚经济共同体对中亚区域一体化影响的研究”, 《国际经贸探索》, 2012年第10期, 第71页;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投资达277亿美元”,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609/20160901391417.shtml>

在社会比较过程中, 中亚国家面临较多的选择, 这对它们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就机遇而言, 在目前没有独立的中亚一体化机制的背景下, 参与由域外国家主导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协定或倡议, 不仅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 可以借此获得各种经济收益或政治支持; 而且中亚国家也节省了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所需要耗费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就挑战而言, 由于域外国家推动或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进程, 不以促进中亚国家形成地区集体身份为己任,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亚国家与域外国家之间的联系, 但客观上却具有削弱中亚国家通过社会比较形成集体身份的可能。鉴于目前中亚地区得到关注最多的地区一体化机制, 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 下文将着重讨论该机制对中亚地区一体化所带来的影响。

之所以选择欧亚经济联盟, 作为讨论由域外国家参与或主导的一体化倡议对中亚国家集体身份形成的影响, 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 对中亚地区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一体化进程进行对比之后可以发现, 由于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 各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方面分歧较少, 这也是上合组织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但经济领域则不同, 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少分歧, 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其次, 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中亚国家曾尝试过多种路径, 这也使该地区的经济合作机制庞杂, 而进展却很缓慢, 这种情况或许有助于理解影响一体化进程的因素。最后, 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 是中亚国家参与的地区一体化机制中发展较为成功的, 它在关税、贸易和市场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如此, 欧亚

经济联盟并未包含所有中亚国家，这不失为理解中亚一体化的典型案例。下文将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例，结合中亚各国的不同态度，讨论影响中亚一体化的因素。



图2 一体化的具体进程^①

一般来说，经济一体化包括两个层面，其中浅层的一体化，只包括边界地区的互动、关税及配额等问题；而深度的一体化则需要超越边界地区的互动，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机构的协调。^②一体化的具体进程，可以从上图得到呈现。事实上，中亚地区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已经做出了较多努力，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这些进步仍然停留在浅层的一体化。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亚大致处于关税同盟阶段。中亚地区浅层的一体化，通常被视为欧亚一体化进程的有力推动因素。在欧亚一体化的进程中，俄罗斯作为主要牵头国家，它推动的欧亚地区一体化更多地关注经济议题，希望建立一种

^① “Economic integration”, http://www.economicsonline.co.uk/Global_economics/Economic_integration.html

^② Burcin Ahmet Yereli, Mustafa Kızıltan and Emre Atsan, “Analysis of central Asia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ject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nvergence hypothesis”, p.255.

政府间合作机制，强化与欧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进而重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①有学者担心，俄罗斯的这种欧亚一体化目标，很可能由最初的区域合作，最终转变为建立一种超国家机构。^②加上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的制裁，使俄罗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策，这影响了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互信。此外，中亚各国对俄罗斯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也持不同意见。

对哈萨克斯坦而言，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身份给它提供了很多机会，最关键的是取消了贸易壁垒和关税。尤其是欧亚经济联盟曾强调建立统一的能源贸易市场，这无疑会给作为世界能源出口大国的哈萨克斯坦，带来诸多好处。同时，在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进行贸易时，哈萨克斯坦的交易成本会明显降低。尽管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绝对收益十分明显，但由此产生的相对收益问题，也使哈萨克斯坦产生疑虑。以俄白哈关税联盟为例，有分析指出，与俄、白两国相比，哈萨克斯坦的获益是最低的。^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哈萨克斯坦过多依赖能源经济带来的收入，其税收结构多元化水平较低。有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的石油收入占国民预算的60%以上，占GDP的33%左右。^④此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强，使哈萨克斯坦经济具有明显的外部依赖性。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使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独联体国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⑤哈萨克斯坦受此影响尤为明显。据统计，2015年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额减少超过三分之一，由2014年的1207.6亿美元减少至2015年的759.1亿美元。^⑥

吉尔吉斯斯坦于2015年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吉总统在加入该组织时曾

① Vladimir Fedorenko, *Eurasian Integration: Effects on Central Asia*, Rethink Institute, 2015, p.1.

② Ibid.

③ Gulaikhan Kubayeva, "Economic Impact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o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 Security Policy Briefs*, 2015, No.20.

④ "When oil prices drop, some countries lose", <https://worldview.stratfor.com/article/when-oil-prices-drop-some-countries-lose>

⑤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изуч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к ЕАЭС. 28.07.2015. <https://regnum.ru/news/economy/1946913.html>

⑥ "2015年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额减少超过三分之一",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603/20160301277162.shtml>

表示，“加入世界上最大联盟之一的组织完全符合吉尔吉斯斯坦的利益”。^①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吉尔吉斯斯坦获得了来自俄罗斯的诸多援助，包括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发展基金、资助吉尔吉斯斯坦边境检查站，以及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协议等。其中，联合发展基金设立于 2014 年 11 月，目标是实现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的现代化。^②除此之外，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也使吉尔吉斯斯坦国民前往俄罗斯务工更为便利。^③但是，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也给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困难。例如，欧亚经济联盟在贸易规则上实行严格的标准，对吉尔吉斯斯坦中小规模企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那些通过转售中国产品获取利润的企业。据统计，吉尔吉斯斯坦从中国进口产品占比已达 37.8%。^④

就塔吉克斯坦而言，它是否会成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尚无法定论。一方面，塔吉克斯坦国内经济实力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影响着塔吉克斯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进程。作为中亚地区最贫穷的国家，塔吉克斯坦人均国民收入为 1110 美元，仅为世界银行公布的中低收入的一半。^⑤另一方面，塔吉克斯坦还面临其他问题，包括在侨汇、吸引外资等方面依赖俄罗斯，经济结构上高度依赖铝和棉花的出口等。^⑥此外，塔吉克斯坦的国内社会保障体系也十分薄弱，用于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支出十分有限。因此，塔吉克斯坦在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这一问题上一向比较谨慎，这既与该国的宏观经济密切相关，也受到塔、俄关系的影响。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有两大原则：一是与世界力量中心保持平衡的距离，二是基本不参加多边一体化组织，坚持发展双边关系（军事技

① “Kyrgyzstan (Finally) Join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May 22,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5/kyrgyzstan-finally-joins-the-urasian-economic-union/>

② Vladimir Fedorenko, *Eurasian Integration: Effects on Central Asia*, pp.9-10.

③ Evgeny Vinokurov, Vladimir Pereboev, “Labour Migr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Impact of Accession to the SES”, *Eurasian Integration Yearbook*, 2013, pp.68-89.

④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kg.html>

⑤ “GNI per capita, Atlas method (current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TJ-XN>

⑥ “Tough times ahead for Tajikistan”, January 25, 2014, <https://globalriskinsights.com/2014/01/tough-times-ahead-for-tajikistan/>

术、经济及其他)。这两项原则在2012年通过的《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构想》中得到了加强。乌前总统卡里莫夫也曾明确表示，不会加入欧亚联盟和关税同盟。^①米尔济约耶夫接任总统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永久中立国土库曼斯坦。出访期间，两国签署了包括战略伙伴条约、2018–2020年经济合作条约、关于进一步深化铁路运输领域内合作的备忘录，以及关于2017–2019年文化–人文领域合作的纲要，等多项协议。^②2017年7月，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部长卡米洛夫曾明确表示，“乌兹别克斯坦不会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③米尔济约耶夫主张，中亚国家通过共同努力解决地区事务，在中亚地区建设睦邻互利合作带。^④这意味着乌兹别克斯坦希望通过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协调，而不是通过加入某一大国创设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来促进中亚地区合作。

土库曼斯坦作为中立国，它与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联系是能源领域。作为能源出口大国，土库曼斯坦出口对象主要是中国（70%）。而土库曼斯坦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占比很小，其中占比最高的俄罗斯也仅为4.1%（2016年）。^⑤此外，土库曼斯坦在能源供给方面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并不需要依赖欧亚经济联盟所提供的市场。与此同时，土库曼斯坦还尝试在欧洲拓宽自己的市场。^⑥由此可见，土库曼斯坦或许仍将保持自己的中立政策。

通过对中亚五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中亚五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对欧亚经济联盟采取或积极参与，或观望犹疑，或保持中立等不同的立场，然而，它们很少从地区利益出发，考虑对欧亚经济联盟采取整体性立场。在这种背景下，中亚国家不可能基于整体性的视角，对

① “Uzbekistan not to join Eurasian Union and Customs Union-Islam Karimov”, January 15, 2015, <http://www.inform.kz/eng/article/2736945>

② Почести Каримову в ходе первого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визита Мирзиязева. 13.03.2017. <https://rus.ozodlik.org/a/pervyi-zarubezhnyi-vizit-mirziyaeva/28364962.html>

③ Амир Жанузакков.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ЕАЭС: вступление исключено, но торговать можно-эксперт. 10.08.2017. <https://365info.kz/2017/08/uzbekistan-i-eaes-vstuplenie-isklyucheno-no-torgovat-mozhno-ekspert/>

④ Бахтиёр Эргашев.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22.02.2018. <http://www.sonar2050.org/publications/uzbekistan-i-evraziyskaya-integraciya/>

⑤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tx.html>

⑥ Гурбангулы Бердымухамедов ищет пути на Запад. 26.03.2015. <https://republic.ru/posts/49755>

中亚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进行深入的社会比较，并提炼出本地区有助于推动地区一体化的特征和优势；并基于这些特征和优势，产生高度的自信和强烈的地区认同。换言之，诸如欧亚经济联盟之类的众多涵盖中亚地区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协定与倡议，虽然为中亚国家借助地区一体化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的繁多，是以削弱或抵消中亚国家推进地区一体化的内生动力为代价的。

当然，除了由域外国家推动或主导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协定或倡议带来的负面效应之外，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角度观之，中亚地区一体化还受到以下因素的牵制。

第一，中亚五国缺乏积极的社会认同，而且内群体在经济领域缺乏互补性，这限制了各国开展地区一体化的意愿。由于没有形成关于“内群体”的积极认同，中亚国家不仅不会强调一体化可能带来的收益，反而认为一体化进程可能制约自身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中亚各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竞争关系，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地位，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的落后状况。上述情况使各国难以达成对“内群体——中亚国家”这一身份的积极认知，这直接影响到各国对地区一体化的态度，进而制约了地区一体化进程。此外，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积极行动，也引发了相关国家的担忧。如哈萨克斯坦方面曾表示，有必要宣布哈萨克斯坦不寻求和不接受任何政治一体化机制。^①中亚五国之间的关系使其难以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实现互补性发展，因而影响了各国协调推进地区一体化的意愿。

第二，中亚五国对一体化缺乏共识性认知，国家间的差异性十分明显，这使中亚国家对群体身份的形成存在分歧。特别是对中亚一体化进程，存在不同看法，进而影响了各国的参与程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中亚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但是两国的目标并不一致。对哈萨克斯坦而言，制衡俄罗斯远比主导中亚地区秩序重要；乌兹别克斯坦则认为，对中亚地区秩序的主导远比制衡外部大国重要。^②乌兹别克斯坦方面认为，中亚地区的

① Vladimir Fedorenko, *Eurasian Integration: Effects on Central Asia*, p.1.

② Damian Rosset, David Svarin, “The Constraints of the past and the Failure of Central Asian Regionalism, 1991-2004”, pp.245-266.

一体化只有在其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才有价值；其他中亚国家则认为，在塔什干统治之下的区域合作是难以接受的。^①中亚地区的现实情况意味着，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只能是一种抱负。^②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而言，由于两国的经济实力较弱，且对外部力量有较强的依赖，因而两国认为一体化是相当不合理的。^③塔、吉两国之所以加入该地区的大部分组织，原因在于它们需要大国提供援助，以及与相关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从而维持本国的发展，同时两国均寻求与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上开展合作。对塔吉克斯坦而言，与俄罗斯的密切合作是维持本国稳定与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也有助于遏制乌兹别克斯坦。

第三，中亚地区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流动性较强，同时缺乏必要的地区性组织来凸显内群体的利我性特征，进而支持或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俄罗斯与美国等大国的介入，加强了内群体与外群体的边界的流动性，加上外群体较强的渗透性，均对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形成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不利于中亚国家形成稳定的身份认知。美国曾将俄罗斯主导的这种一体化，视为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强调其不仅希望控制经济，还包括政治。2012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表示，要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减缓或阻止欧亚联盟。^④此外，印度、欧盟等也在积极参与中亚地区的地区事务。大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仅为中亚各国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多元化的选择，加剧了各国在地区一体化问题上的分歧。

总体来看，各国对中亚一体化的不同意见，影响着它们参与地区一体化的意愿；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则制约着它们的参与能力；俄罗斯、美国关于一体化的不同倡议，也影响着中亚国家的具体选择。它们不仅对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存在意见分歧，而且对其他地区性组织也态度不一，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地区一体化停滞不前便能够得到解释。

①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pp.185-202.

② Ruth Deyermond, "Matrioshka hegemony? Multi-levelled Hegemonic Competition and Security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9, Vol.35, No.1, p.162.

③ Damian Rosset, David Svarin, "The Constraints of the past and the Failure of Central Asian Regionalism, 1991-2004", p.262.

④ <https://www.ft.com/content/a5b15b14-3fcf-11e2-9f71-00144feabdc0#axzz2ELqiVuXH>

目前来看，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虽然进展缓慢，但随着中亚五国逐渐开展合作，中亚国家从“社会比较”阶段过渡到“社会认同”阶段，仍然是值得预期的。尤其是在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比较过程中，中亚国家会更加重视通过相互合作处理内部事务。这不仅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身份认同，也能够推动中亚地区一体化的进一步展开。如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一改此前卡里莫夫总统对地区一体化敬而远之的态度，积极推动中亚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善和中亚国家间的地区性合作。2018年3月，米尔济约耶夫总统访问塔吉克斯坦期间，与塔方签署了27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经贸、投资、交通、水利、旅游和安全等领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塔乌两国部分边界地段的条约，以及塔乌两国关于睦邻友好的联合声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甚至公开表示，塔乌两国已解决了“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①乌兹别克斯坦对地区合作立场的改变，与纳扎尔巴耶夫对推动地区一体化的一贯热衷相结合，有助于为该地区一体化注入新的动力。当然，中亚国家之间能否形成更为深入、更为强烈的群体认同，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毕竟各国内部形势、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以及外部大国介入等因素，均会对这一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未来形势如何，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五、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前景

事实上，中亚各国之间的相似文化及共同历史，尤其是各国自苏联时期继承而来的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联系，为各国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此同时，中亚地区复杂的安全形势，为中亚国家间合作提供了契机。冷战后，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为有效应对这些威胁，客观上也需要中亚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在经济相互联系和安全唇齿相依的情况下，通过地区一体化来促进各国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与稳定，或许是最优路径。事实上，中亚国家也的确做过一些推进地区一体化的尝试，如组建中亚合作组织等。然而，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中亚一体化进程

^① “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多项合作文件”，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10/c_1122515998.htm

十分缓慢，甚至陷入停滞状态。

不过，2018年3月15日召开的中亚峰会，或许意味着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有望得到重启。尽管此次峰会并未就涉及中亚一体化的一些实质性问题——推进地区合作的呼吁，是否意味着要推进地区一体化？如果推进地区一体化，是否需要采取重新建立正式机制的形式？如果采取正式机制的形式，将使用何种组织名称和采取何种决策机制？等等——做出重要决定。但自2005年以来，中亚国家第一次召开没有外部大国参与的峰会，仍是一项重要的成就。它至少意味着中亚五国克服了彼此间的矛盾，表达了推进地区一体化的意愿或信心，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同时也是近年来中亚五国间关系改善所带来的积极结果。而这种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米尔济约耶夫担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调整。乌转变了此前对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冷漠甚至怀疑的态度，积极推动中亚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善，甚至倡导中亚五国元首峰会的召开。加上一直以来对中亚地区一体化持热情推动态度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响应与配合，此次中亚峰会才得以顺利举行。

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角度来看，中亚峰会召开的突出意义在于，中亚五国之间开始经由社会比较的阶段，进入了尝试构建地区认同的阶段。而中亚各国能否经由地区认同进而增进各国间的彼此认同，最终形成一种关于本地区的集体身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前景及其命运。考虑到中亚国家毕竟具有长期同处一个国家的历史经历，甚至时至今日仍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社会诸领域，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一旦各国致力于将推进地区一体化作为各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任务加以推进，中亚地区一体化迅速取得突破也是有可能的。另外一个与中亚形势并不密切相关、但可能赋予中亚地区一体化以新动力的趋势，是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界诸多地区涌现的逆全球化浪潮。这种趋势或许会使中亚国家产生危机感，并积极构想通过国家间合作的方式，来应对趋于严峻的全球经济形势。再加上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变得相当克制，不但主动改善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积极为推进中亚地区合作出谋划策，这进一步增加了各国形成一种集体身份的可能性。

这些形势的转变，意味着中亚一体化面临一个新的机会窗口。按照温特有关集体身份需要四个条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克制——共同作用的观点，中亚国家在这四个方面面临的形势比较积极。它们要么具有深厚的客观基础（相互依存、同质性），要么形势正在向积极的方向演变（各国对共同命运的认识有所提高，乌新政府上台后展示了越来越多的自我克制）。一旦真正将中亚地区一体化视为己任，并有克服内外部各种障碍的决心，那么，各国彼此间形成集体身份就具有较好的前景。此次中亚地区合作得以推进的背景，与此前中亚国家建设中亚合作组织不同的是，中亚合作组织的演进过程，横跨了社会类别化与社会比较两个阶段。而此次地区合作的开展，处于中亚各国从社会比较迈向社会认同的阶段。在社会类别化阶段，中亚各国的优先任务在于明晰本国与他国之间的差异，并以推进国家建设与社会转型为己任；而在社会比较阶段，各国初步完成了国家建设与社会转型的进程，有一定的信心和能力开展国家之间的合作，对国家主权问题不再那么敏感。这也是当前的中亚一体化进程一旦启动，有望避免步其前尘的希望所在。

不过，具体形势要比理论演绎更为复杂，也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原因在于，中亚五国峰会的召开，仅仅意味着它们经由与外部行为体的社会比较而对各国同属“中亚国家”这一类属身份，有了明确意识和初步认同。但它们要超越对相似客观因素或共享情感体验的强调，并将他国利益视为自我利益的延伸，仍有一定困难。相似的客观因素包括，共同的地域以及相似的历史、文化、精神等因素；共享的情感体验包括，各国对相似的文化 and 历史命运的认知等。而将他国利益视为自我利益的延伸，是集体身份的标识。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各国并未打造出一种集体身份，中亚仍处于机制化远远不足（under-institutionalized）的状态。这会吸引外部大国提出它们的解决方案，并通过分而治之的战略推进这些方案”。^①有鉴于此，可以预料，即使中亚峰会预示着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得以重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依旧不确定。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通过运用社会认同理论来研究中亚一体化进程，希

^① Bilahari Kausikan, S. Frederick Starr and Yang Cheng, “Central Asia: All Together Now”, June 16, 2017, *The American Interest*,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7/06/16/central-asia-all-together-now/>

望能够提供一种从社会认同的视角，检视中亚地区一体化历史进程及其发展前景的分析框架，打破此前在分析一体化时采取静态描述的习惯思维，尝试为理解地区一体化进程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当然，有必要承认，由于本文属于理论运用型研究，或许存在用理论裁剪现实或理论分析与具体实践存在一定出入的问题。毋庸置疑，任何理论均是对现实世界的提炼和简化，它们不可能对丰富复杂的现实世界进行准确无误的描述。如果理论观点总体契合现实的大致发展进程，并且能为人们了解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观察视角或带来新的洞见，那么，这种尝试仍然是值得的。

【Abstract】 To achieve integration, Central Asia should go through three stages, namely, social categorization, social comparison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Currently, Central Asia is undergoing the second phrase. In order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all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hould enter the third stage. The existence and operation of various region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advocated by Russia,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difficulty in entering the social identification stage. Although we cannot rule out that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may achieve some progress in the future, achieved either under internal coordination or external promotion, yet it will still rely o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 exceeding the current stage of social comparison into the third stage. The Central Asian Summit in March 2018 might mean that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in Central Asia is expected to reset. However, it is still a long-term prospect rather than an immediate reality that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form a collective identity.

【Key Words】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Central Asia, the Central Asian Summit

【Аннотация】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ужно пройти три этапа: социальную категоризацию, социальное сравнен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ую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ю.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этапе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равнения. Дл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прорыва в

интеграции все страны региона должны вступить на этап соци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Одной из причин трудностей в эт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является наличие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инициированных Россией. Хотя и нельзя исключа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двига в сфере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утём внутри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координирования или проталкивания извне, однако всё зависит от переход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из этапа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равнения на этап соци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Саммита лидеров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марте 2018 года может означать, что имеется надежда заново начать процесс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днак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у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заимоприёмлемой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сё-таки являетс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ой, а не реалией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ая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аммит лидеров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责任编辑 阎德学)